

「三權分立」論的要害是去中央化

特首林鄭月娥近日表示，「三權分立」議題在過去一周社會辯論「愈辯愈明」，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主導、以特首為核心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，希望此事以後不會成為炒作議題。實際上，反對派若再炒作「三權分立」議題，只是自暴「港獨」面目，不得人心。

黎子珍

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就所謂「三權分立」問題作出撥亂反正的表述，港澳辦、中聯辦發言人發表談話，表示贊同和支持。兩辦聲明指出，關於「三權分立」的爭議，涉及如何正確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大問題，必須說清楚，講明白。

港三權之上有凌駕性的中央權力

兩辦發言人表示，政治學意義上的「三權分立」一般是對主權國家政體而言。香港一些人鼓譟香港實行的是所謂「三權分立」，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，其真實意圖是欲擴大立法權和司法權，削弱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管治權威，抗拒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，從而挑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，把香港變成一個脫離中央管治的獨立政治實體。這是要害所在。現在必須正本清源、撥亂反正，把被顛倒的是非顛倒過來。

政治體制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核心內容，體現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，規定了特別行政

區內部的基本政治架構。我國是單一制國家，香港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，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。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中央以法律規定的，香港特區不能自行決定。就權力來源而言，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、立法權、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，均來自中央的授權。香港政制就其屬性和定位來說，仍是一種地方政治體制，在香港的三權之上，存在一個凌駕性的中央權力，這是一個縱向的權力隸屬關係，絕非與香港內部處於同一層面的橫向分權關係。

三權都要有國家觀念

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基本法起草至今，中央有關部門權威人士和內地專家學者多有論述，明確指出香港政治體制無論在回歸前還是回歸後，都不是「三權分立」。早在1987年4月，「一國兩制」構想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，就明確指出：「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，不

能照搬西方的一套。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、美國的制度，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。現在如果完全照搬，比如搞三權分立，搞英美的議會制度，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，恐怕不適宜。」鄧公的談話，成為基本法起草的指導思想。

三權在中央的全面管治下合作，都要有國家觀念，才能有效管治香港和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。對此，2008年7月，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蒞港期間，在接見特區主要官員時提出：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個機構，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，共同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這樣一個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。」及2017年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進一步表明：「不論是行政機構主要官員，還是立法、司法機構負責人，都要有國家觀念，在開展政務活動和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，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題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。」

香港從未存在所謂「三權分立」，香港有一部分

人混淆視聽，宣稱香港是「三權分立」，是企圖通過司法和立法來制衡、扭曲行政權，及試圖將法官凌駕於全國人大等。「三權分立」的歪理每隔幾年就會被反對派拿出來翻炒一次，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為解決香港問題而進行釋法時，反對派就會祭出這從來不曾存在過的「三權分立」，其根本目的，就是為了否定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，其本質就是煽動「港獨」。

「三權分立」既然是「偽命題」，反對派為什麼不厭其煩地炒作呢？究其實質，就是企圖擴大立法權及司法權，將司法獨立搞成「司法獨大」、「司法獨裁」，架空行政權，矮化行政長官，進而達到否認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邪惡目的，將香港變成「獨立」或「半獨立」的政治實體，骨子裏是「港獨」思維在作怪。但是，反對派若再炒作「三權分立」議題，只是自暴「港獨」面目，不得人心。

國家創造抗疫奇跡啓示香港

蔡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

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，顯示國家抗疫取得了巨大成功、創造了世界奇跡。中國抗疫的主要成功因素，一是制度高效，二是重視科學和生命。有了這兩樣法寶，足以戰勝任何內外挑戰，讓人對中國道路充滿信心，也讓廣大香港市民更相信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與全國人民同呼吸、共命運，風雨同舟，是香港發展的不二選擇。香港各界更應齊心協力，排除干擾，抓緊中央支持的機遇有效抗疫，盡快實現疫後復甦，與國家攜手再創繁榮穩定。

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結中國抗疫之戰的經驗，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：第一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顯著優勢，是抵禦風險挑戰、提高國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證；二、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鑄就了生命至上、舉國同心、捨生忘死、尊重科學、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。

彰顯國家制度優越性

這場世紀疫情成為各國執政效能的重大考驗，中國以超乎尋常的速度，在兩個月內控制了疫情，凸顯了中國制度的高效優勢。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，中央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，第一時間實施集中統一領導，習近平主席親自部署、親自指揮，因時因勢制定重大抗疫戰略策略。中央的堅強領導下，全國迅速形成統一指揮、全面部署、立體防控的戰略布局，舉全國之力實施規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，調動包括解放軍在內的全國各地醫護人員緊急馳援湖北、武漢抗疫，之後在十多日內先

後迅速建成雷神山和火神山臨時醫院，大規模改建16座方艙醫院、迅速開闢600多個集中隔離點。

正是在「全國一盤棋」統籌指導下，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積蔓延，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。再次證明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非凡的組織動員能力、統籌協調能力、貫徹執行能力，能夠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、辦難事、辦急事的獨特優勢，彰顯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獨特優越性。

西方所謂民主國家，一向把尊重人權掛在嘴邊，但對比此次抗疫手法可見，真正尊重人權、尊重生命的，是中國。中國沒有搞西方的「群體免疫」，中國抗疫堅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不惜一切代價救治生命，不遺漏一個感染者，不放棄每一位病患，80多歲的老人也全力去救，費用全部由國家承擔。中國對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高度負責，充分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。

中國堅持以科學精神、科學態度抗疫，以專家科學合理的意見作為制定抗疫決策的支撐。鍾南山、張伯禮、張定宇、陳薇等「抗疫英雄」，如國寶一樣，獲得國家最高禮遇的款待，接受習近平主席的親自頒授勳章和獎章，盛況令人動容。表彰活動正是體現中國對科學精神的尊崇和弘揚。正如鍾南山在活動結束後形容：「就像歡迎國外總統一樣。這個使我很意外」，「我感到激動不是覺得我的禮遇有多高，而是感受到黨和國家對醫護的愛護。」

中國堅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、舉國同

心、科學防治、精準施策，創造了世界抗疫的奇跡。眾所周知，中國擁有14億人口，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國，又是疫情最早爆發的國家，但如今中國的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數比例是全球最低，同時做到抗疫和發展兼顧，令到經濟付出最小的代價，今年二季度GDP增長已止跌回升，增長3.2%，是全球唯一錄得經濟正增長的國家。中國在抗疫和發展都交出亮麗的成績單。

香港須抗疫兼顧經濟

國家成功抗疫、迅速恢復經濟的經驗，值得香港認真仿效。由於受到不必要的政治化干擾和「黃醫護」抹黑及反面渲染，香港防疫措施落實不夠到位，導致疫情反覆，拖累經濟民生，最終受害的是廣大市民。

上下同欲者勝。香港要徹底戰勝疫情、早日重振經濟，關鍵是社會各界、廣大市民凝神聚力，首先要支持配合政府的抗疫政策和措施，包括積極參與在中央支持下開闢的普及社區檢測，相信科學相信專家，為健康碼、恢復正常跨境交往作好準備，抵制一切政治化的抹黑和謠言，令抗疫更順利有效。

香港更要看到國家在抗疫上已經取得階段性勝利，今後的焦點已轉到經濟發展之上，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、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，香港更應做好防疫功夫，一手控制疫情，一手重振經濟，發揮香港所長，配合國家發展所需，進一步鞏固香港優勢、拓展發展空間。



珍惜普檢延長長期機會 早檢查早發現早治療

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

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，當前香港特區政府開展了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」，至昨日暫時共有18名檢測者對病毒呈陽性反應，包括外傭、退休人士及大圍交通城群組等，顯示普檢確實有效，成功發現社區隱形患者。

截至昨日下午2時，已有136.2萬人次接受採樣，有126.1萬人次在網上登記預約。特區政府昨宣布，普檢計劃有57個檢測中心，會延長服務多3天至9月14日，即整個計劃為期14天。在已完成檢驗的樣本中，初步顯示社區存在不少隱形患者，這很有可能造成二代傳播。當前及早檢測出這些少量患者，控制「傳播者」，才能保障香港防疫工作取得關鍵性成果。當前中央政府提供人力以及資源支持，為全港進行社區普檢提供最大的支持，港府應在此助力下加緊呼籲、動員更多市民參與檢測，早檢查、早發現、早治療，抗疫之戰才能早日唱響勝利的凱歌。

在當前全球投入針對新冠病毒疫情的防疫之戰中，最為狡詐的影響因素是，目前醫學界對於新冠病毒還沒有完全了解，在疫情初期有數據顯示，新冠病毒的基本傳染數（即一個病人可傳染幾人）為3至4人，後來另有文獻則顯示可高達6至8人。另外相對於其他以前出現大幅傳播的病毒，新冠病毒具有不同的特性。比如SARS、伊波拉感染者只在出現症狀後才有感染性，因此相對更容易控制；但是新冠病毒存在隱形傳播，即無症狀、潛伏期患者也具有感染性，因此新冠疫情相對而言更難以控制。另外醫學界甚至對於新冠病毒的潛伏期都有不同意見，初期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潛伏期為2-10天，但後來獲得更多數據後，有更多意見認為潛伏期長達14-20天。在新冠病毒種種不同特性的因素影響下，要針對病毒進行有效病源追蹤、控制，具有很大難度，需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更高。

因此，當前港府需要借鑒內地已被證明有效的抗疫經驗，即控制傳染源、切斷傳播途徑和保護易感人群。而由於隱形傳播者的存在，當前普檢是控制傳染源、切斷傳播途徑最有效的抗疫戰略，現在內地有500多名檢測人員馳援香港，目前重任是鼓勵更多市民把握普檢延長期寶貴機會，積極參與普檢，找出隱形患者控制疫情。

在全球肆虐的病毒面前，全港市民生命健康第一，任何其它問題都應屈居其次。社會各界應積極配合政府工作，動員、教育更多市民參與普檢。但現階段仍有激進人士不斷造謠抹黑，企圖再次離開政府與市民、中央與香港之間的信任關係。如此行為不僅是無中生有，更漠視港人的生命與健康安全。這些激進人士「陰謀化」一切政府合理行為的做法，令人不齒，也讓人失望。香港市民如因為誤信莫須有的攻擊和抹黑而止步普檢，最終受損的是自己。因此盡快參與普檢，這不僅是市民保障個人健康的應有態度，同時也是作為公民切身維護全港福祉應肩負的責任。



法庭保釋制度豈容濫用

江樂士

在法律原則上，法庭盡可能會讓涉及刑事罪行的疑犯保釋外出，這是有理可依的。在未被定罪之前，任何疑犯都會先假定為無罪，除非有充分理由，否則在定罪前不應被監禁。此外，案件可能要花幾個月時間才會進入聆訊階段，尤其以複雜的案件為甚。一般來說，法庭認為不宜長期剝奪疑犯的人身自由，若候訊人可能最終被判無罪釋放，這一點就顯得更为重要。

在判斷某人會否潛逃，法院可以考慮罪行的性質、嚴重性以及證據是否有力，但鑑於早前有不少參與示威活動的被捕人士潛逃，所以疑犯的「背景」和「組織連繫」也至關重要。只可惜法庭往往看輕或沒有查明疑犯的「組織連繫」，這一點必須作出改變。

港保釋制度受到了全面濫用

如果有人涉嫌挑起社會動亂，他很有可能熟悉支援示威運動的人脈網絡，包括境外的支援人員。例如在去年7月1日，梁繼平有份破壞立法會大樓，其後他就被匆匆送到美國，抵埗後更受到熱烈歡迎。另外一個例子是暴亂疑犯黃台仰和李東昇在高等法院獲保釋，其後沒有出庭受審，更在外國特工的協助下逃往德國，在那裏獲得「政治庇護」。此外，有些疑犯成功偷渡往台灣地區，另外一些就在英國現身，受到像「香港觀察」那樣的反華組織熱烈歡迎。

任何客觀分析均會斷定，保釋制度受到

了全面的濫用，法庭必須正視這一點，應當全面考慮保釋條件和罪犯潛逃的風險，而不是隨意地准予保釋。

此外，以美國為首的幾個國家近日中止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協議，而像法國的其他一些國家則停止與香港商議引渡安排。這些國家不再承擔遣返罪犯回港受審的法律義務，實質上是鼓勵罪犯潛逃海外。

顯然，司法界務必留意這一事態發展，並應在批准保釋前充分考慮此一因素，若被告與上述任何一個國家有某些特別聯繫時，更應如此。

目前，某些勢力已在全球範圍建立起一整套縝密的潛逃安排，而且資金充裕，專門協助涉及反政府活動的罪犯或嫌犯外逃，構成了疑犯不小的潛逃誘因。對此，法庭必須要因應形勢作出變通。法庭准予嫌犯保釋前，必須經過全面調查，弄清楚他們與社會動亂搞手和境外支持者之間是否有聯繫。

法庭只有全面評估潛逃風險之後，方可批准嫌犯保釋。儘管此舉相當耗時，而且需要仰賴警方的情報，但都值得做，因為此舉是為了確保司法公義得到伸張。

法庭應設定合理的保釋條件

如果法院擬准予保釋，就應多做功夫以降低疑犯潛逃的風險。鑑於某些法庭的寬大處理明顯失策，因此應停止開出最低保釋條件的做法，而應設定合理的

保釋條件。例如，法庭若允許涉嫌暴亂、襲警或分裂國家等重罪的疑犯保釋，必須開出嚴厲的保釋條件，除了要求至少提供兩項大額的財務擔保之外，還必須要求嫌犯上繳所有旅行證件，並且居所固定。

現行的疑犯每周向警局報到的制度應改為每日三次向警局報到，即早、午、晚三次，如此最大限度地縮小他們可能潛逃的時間。除了對疑犯居所的要求之外，還必須要宵禁，例如晚上8點至凌晨6點之間不可出門。此外，還必須禁止疑犯與特定的個人或組織聯繫，尤其是不能與那些參與示威活動或海外逃亡組織有關聯的人聯繫。另一保釋條件是，疑犯必須遠離特定地方，例如港口和海灘，以免其循海路潛逃。

電子輔助設備明顯可以有效地防止潛逃，值得本港處理與示威運動相關的案件時參考。香港已經採用腕帶設備跟蹤新冠病毒隔離人員，此法可供法庭處理保釋參考。

法庭收緊保釋條件，司法公義將是最大受益者。香港不應再容忍保釋犯潛逃的情況出現，違者必須要承擔法律後果。警方追捕嫌犯和收集罪證都需要耗費大量時間人力，但法庭開出的保釋條件卻與現實嚴重脫節，讓疑犯能輕易棄保潛逃，白白浪費警力。

（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，本文原文發表在《中國日報》評論版，有刪節。）

不容港大成為鼓吹仇恨內地的法外之地



關心

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教聯會理事

據報道，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9月1日在多個社交平台發布一段「Welcome to XGU!」（Xiang Gang University）惡搞片段，內容將內地生誣蔑為「間諜」，諷刺內地生搶走港大獎學金資源，並扭曲香港大學的傳統是恐嚇、極端民族主義、獨裁、政治宣傳、共產主義。片段中除了充斥對內地學生的仇視言論，更惡劣的是散布對國家的負面標籤及對內地的憎恨情緒。其後，港大校方發出聲明批評該片段，強調影片內容不代表港大大多數人的觀點，要求校園電視將影片下架及道歉。

港大校園散播仇恨內地言論並非單一事件。自港大學生會刊物《學苑》發表《香港民族命運自決》專題文章，被時任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「鼓吹港獨」，港大校園就埋下本土主義抬頭、鼓吹仇恨內地的惡毒基因。今次事件主角之一，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主席游展鵬，曾經於專訪表示他們的政治立場是「本土派」，並毫不避諱地認為「香港獨立」是香港前途問題其中一個解決方法，可見某些港大學生對分離主義以至「港獨」的傾向是根深蒂固。港大校園電視出現上述鼓吹仇恨內地的節目並不足為奇。

港大作為本港一間歷史悠久、排名數一數二的高等院校，很多學生對港大趨之若鶩，每年為香港培養大量優秀人才。可惜，近年港大學生一次又一次捲入政治風波以至社會事件，令港大校園出現仇恨內地現象，形成一股本土主義甚至「港獨」的傾向，罪魁禍首當然是非法「佔中」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。當年，梁振英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《學苑》出現「港獨」思潮，戴耀廷急不及待發表文章批評梁振英干預學術自由，指討論「港獨」並不構成任何問題，明目張膽為鼓吹「港獨」的文章辯護。2018年3月，身為港大法律學者的他，不避嫌出席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主辦的論壇，公然宣示香港可以考慮成為「獨立的國家」。以上種種，均看到港大校園出現仇恨內地言論，某些極端學生憎恨國家，走上「港獨」之路是有其原因。

有評論指出，近年港大世界排名有所下降，某程度跟港大教授鼓吹學生投入政治活動影響學術研究有關。早前，據《泰晤士高等教育》公布2021年世界大學排名，香港大學排名下降4位跌至全球第39位。港大作為一間國際化的高等院校，保持開放平等的學習環境以吸引內地甚至全球各地優秀學生入讀，對港大發展尤其重要。港大校園三番四次出現仇恨內地學生的言論，不單阻礙內地學生與香港的交流，更窒礙世界各地優秀人才來港就讀的吸引力。因此，我們促請港大校方除了發出聲明譴責外，應將有關人士例如游展鵬交由學生紀律委員會調查，並加以懲處，不容港大校園成為鼓吹仇恨內地的法外之地。

